



ZHONG GU
中国现代小说
OXIANDA
美学思想史论
IXIAOSH
UOMEIXU
ESIXIAN
GSHILUN

主编

蒋心焕

副主编

郭济访

万直纯 魏 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中国现代小说 美学思想史论

KESIXIANGSHILUN

主编 蒋心焕
副主编 郭济访
万直纯
魏 建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小说美学思想史论/蒋心焕主编.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6. 3
ISBN 7 - 5399 - 2347 - 4

I. 中... II. 蒋... III. 小说-美学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J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4267 号

书 名 中国现代小说美学思想史论
主 编 蒋心焕
副 主 编 郭济访 万直纯 魏 建
责 任 编 辑 文 莱
责 任 校 对 夏 天
责 任 监 制 胡小河 张莘莘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网 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4 万
版 次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7 - 5399 - 2347 - 4/I • 2220
定 价 20.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上 编

- 3 第一章 新世纪的小说神话
——二十世纪初期的小说美学思想
- 18 第二章 在雅与俗之间的现代转化
——“五四”时期的小说美学思想
- 37 第三章 多元化的探索与建设
——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中期
 的小说美学思想
- 62 第四章 炼狱中的蜕变与新生
——三十年代后期至四十年代后期
 的小说美学思想

下 编

- 85 第五章 鲁迅：伟大的奠基者
- 107 第六章 茅盾：艰难的选择
- 121 第七章 创造社：为艺术而艺术

- | | |
|-----|-------------------|
| 133 | 第八章 阿英：呼唤小说之“力” |
| 146 | 第九章 老舍：生命的观察与体认 |
| 161 | 第十章 废名：梦的美丽与狂放 |
| 182 | 第十一章 丁玲：现代女性美学 |
| 200 | 第十二章 沈从文：美在生命之中 |
| 220 | 第十三章 新感觉派：现代都市风景线 |
| 234 | 第十四章 李健吾：诗意的观照 |
| 247 | 第十五章 张爱玲：朴素的传奇 |
| 264 | 第十六章 七月派：主体性的张扬 |
| 283 | 第十七章 赵树理：为“文摊”写作 |
| 302 | 主要参考书目 |
| 306 | 后记 |

上 编

中 国 现 代 小 说 美 学 思 想 史 论
Zhongguo Xiandai Xiaoshuo Meixue Sixiang Shilun



第一章 新世纪的小说神话

——二十世纪初期的小说美学思想

解放以前出版的学术著作，诸如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文艺论丛》第十四辑）等，都注意到“五四”文学和近代文学的关系及时代思潮同文学变革的关系。但这些史著，由于所论的角度或侧重点不同的缘故，大都只提出了问题，未能展开论证；有的论著，或立论失之偏颇，或资料明显荒缺。虽然有好多问题留下空白，但先驱者的起步却是可贵的。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研究工作者以新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翔实的资料，对这个专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的几个基本问题》、沙似鹏的《“五四”小说理论与近代小说理论的关系》等专论，对进一步研讨这个专题，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评论界对梁启超为代表的“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进行探讨和研究的文章为数不少，但我觉得从理论的整体上进行评价的文章并不多，且往往有偏高的倾向，如为说明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差不多都说，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为“五

“四”新小说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样的看法缺乏必要的分析，也不符合小说演变的实际，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探讨。

梁启超等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若归类作平行分析，确实是触及到好些方面的问题，比如小说的真实性、小说的功利观、小说的艺术特点等，但它的核心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更值得评论者去探求。简单说来，它的核心，或它的本质，乃是视小说为政治工具，小说具有万能的社会之力。梁启超多次强调了这个意思。一八九七年，他论及日本变法时，指出：“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①一九〇二年，更为明确、系统地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②在梁启超的极力鼓吹和影响下，继起的一些论文，如陶祐曾的《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天僇生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词》等，更是把小说的作用夸大到极限，说什么：“小说势力之伟大，几几乎能造成世界矣。”^③“吾以为吾侪今日，不欲救国也则已，今日诚欲救国，不可不自小说始，不可不自改良小说始。”^④“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⑤诚然，梁启超的小说理论，

① 梁启超：《蒙学报演义报告合序》，《饮水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天僇生：《〈新世界小说社报〉发刊词》，《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④ 天僇生：《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⑤ 陶祐曾：《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涉及到文艺的真实性、文艺的美感作用、文艺的功利观等，也可以说，他的小说理论是自成体系的，但问题在他未能科学地论述真实、美感和功利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忽略了文学的第一要义是真实，把文艺的功利性抬高到很不恰当的地位；他从读者乐意接受小说艺术的角度分析小说的特征具有四种力量：“一曰熏。……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人，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① 但梁启超在论述小说美感性时，一是没有强调美感性对真实性的依赖关系；二是忽略美感作用相对的独立性，把美感仅仅看作是从属功利观的附属。他正是从这样的角度理解、论及“四种力量”的。所以，他不无偏激地指出：“文学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②

从上述的总体分析中，我们可以引申出这样两个基本认识：

就社会目的看，梁启超等人所提倡的“小说界革命”及其理论，仅仅是为了“新民”的政治需要，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他翻译的著名小说《经国美谈》和《佳人奇遇》以及他创作《新中国未来记》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梁启超等人，在寻求其“新民”途径之中，发现小说乃是一“简易之法”，可以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③，从而达到宣传维新派的政治主张和理想的目的。

梁启超的小说美学思想，就思想基础说，是属于唯心主义范畴。梁启超等人颠倒了社会存在和思想意识的关系，把小说作用夸

^①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③ 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大到可以扭转乾坤的地步，这就走上了历史唯心主义道路。当时就有人清醒地指出：“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惟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失当。余为平心论之，则小说固不足生社会，而惟有社会始成小说者也。”^①一九二八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社、太阳社中个别人对文艺作用的看法，基本上也是这样的唯心主义估量。鲁迅尖锐地指出：“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扇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倘以为文艺可以改变环境，那是‘唯心’之谈。”^②

以上所议，是否对梁启超等人提倡的“小说界革命”及其理论有肯定不足，怀疑有余之嫌呢？没有。上面仅是从小说理论的总体上进行了分析，若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中国自来小说不入史，“小说是向来不算文学的”^③，“向来是看作邪宗的”^④这个角度看，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的出现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无疑是晴天的一声霹雳。众所周知，“小说”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外物篇》，初指琐屑的言谈、小的道理，同我们今天理解的小说不是一回事。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虽出现了“小说家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的记载，但班固仍认为小说是“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其语浅薄”，“迂诞依托”，并断言这是一种“君子弗为”的“小道”。他虽然在《诸子略》中著录了小说家，但将其列入“诸子十家”之尾，并且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班固鄙薄小说，不言而明。这里须指出，班固所规范、指定的“小说”，同以后统治阶级及其文人从文学体裁

^① 觉我：《余之小说观》，《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鲁迅：《草鞋脚·小引》，《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 鲁迅：《徐懋庸作〈打杂集〉序》，《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上规定的小说，这两者所包含的内容是不同的，但他们对小说所取的鄙视态度则是相同的。鲁迅说：“史家成见，自汉迄今盖略同。”^①这种“成见”一直延续到清代，基本上无甚变化。“仁义道德，羽翼经史，言之大者也。诗赋歌词，艺术稗官，言之小者也。言而至于小说，其小之尤小者乎！士君子上不能立德，次不能立功、立言以共垂不朽，而戋戋焉小说之是讲，不亦鄙且陋哉！”^②在全部意识形态中，把小说视作“鄙且陋”的偏见，竟是如此根深蒂固！

面临着如此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梁启超等人登高一呼，呼吁“小说界革命”，把小说提到文学之中最“上乘”的地位，认为小说可以新国，新民，新一切，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种物极必反的现象在历史变革中是屡见不鲜的。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及其理论一出现，在当时即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序》中说：“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乎汗牛充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

这影响也延伸到“五四”前后。钱玄同在《寄陈独秀》信中说：“梁任公先生实为近来创造新文学之一人。……即其文章，亦未能尽脱帖括蹊径，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梁君之作《新民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皆用全力为之，未尝分轻重于其间也），此皆其识力过人处。鄙意论现代文学之革新，必数及梁君。”^③钱玄同的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王希廉：《〈石头记〉的〈护花主人批序〉》，《红楼梦》（三家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③ 钱玄同：《寄陈独秀》，《文学运动史料选》第1册，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这个看法，是符合中国文学演变的实际的，“五四”新小说正是以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作为起步而向前发展的。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言论告诉我们，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是在前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每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发生、变革都有其承前启后的继承关系。恩格斯曾多次说过，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五四”新文学，固然主要是摄取了异域文学的各种养料而勃兴起来，但它并没有脱离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的优良传统，这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内在力量，是任何外来力量都隔不断的。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②以矛头主要指向封建文学为号召的“五四”新文学，同样未能摆脱先辈们传下来的反封建文学的优良传统。

“五四”新小说和近代小说的关系也是如此观。一方面，“五四”新小说理论是以近代小说理论作为自己的思想资料和由此出发的前提，另一方面，由于“五四”新小说和近代小说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产物，它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它们所服务的时代要求不同，特别是“五四”以后由于无产阶级思想的宣传和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带来了指导思想的不同，这样，它们二者之间，既有继承性，又有差异性。学术界已有的成果主要侧重于前者进行了论述，这里我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转引自《文艺报》1985年第5期。

着重于后者谈几点认识。

一、小说和群众的关系。“五四”新小说理论和近代小说理论都强调开发民智，深深地打上启蒙主义的烙印。梁启超提倡的“小说界革命”及其理论，就是以“新民”说为其理论基础的。他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其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① 梁启超的“新民之道”包括好多方面的途径，“小说界革命”无疑是重要途径之一。我们不能否认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在“新民”和“群治”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要指出他的“新民”论的局限性。梁启超等人当时代表着中国的“开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转化为资本家”^② 的阶级利益，在政治思想上是“主以中学（君主）辅以西学（立宪）。”^③ 就是说，一方面，梁启超努力吸取了西方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对代表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儒家思想并没有与之彻底决裂；或者说，民主主义只是他的一层外壳，而内里为主的还是封建主义。这就决定了“新民”说的不彻底性，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教化民众”。而“五四”新小说理论和创作，则是建立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其目的在真正的唤醒民众，使之在思想上摆脱长期的封建思想统治，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导力量。茅盾这个时期的小说理论，高出与同时代人者，正在于此。他热情呼吁“申诉现代人的烦闷，帮助人们摆脱几千年历史遗传的人类共有的偏心与弱点”，同时，“又隐隐指出未来的希望，把新理想新信

① 梁启超：《新民说·叙论》，《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② 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③ 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篇》，《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仰灌到人心中”^① 的这样一种文学的出现。无疑这是一种不同于过去的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新型的文学。鲁迅小说创作的启蒙主义的深刻性，不仅表现在揭露上层社会的堕落，表现下层人民的不幸，从而“利用他（指小说）的力量，来改良社会。”^② 而且深入被压迫者、被剥削者的思想深处，展现人们的精神弱点和灵魂创伤，从而“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③ 这就使鲁迅的小说高出同时代小说家的作品。当时为数不少的小说，以民主主义、人道主义为思想武器，描写了劳动者啼饥号寒的苦难生活和悲惨命运。而鲁迅不止于此，他集中剖析了劳动人民在肉体上，更在精神上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他对劳动者所表现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忧愤深广的感情也就超越了一般的人道主义同情心，因而他的小说创作在“五四”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和思想启蒙中发挥了极有力的战斗作用。

二、科学化、现代化的新小说观念的初步建立。“五四”新小说理论和近代小说理论，都注重从异邦求新声，从传统吸营养，但其态度和方法有高下之分，其发展趋向是小说的科学化、现代化特征日益明显。

一是为短篇小说正名。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理论中，把小说和史籍，小说和图画等加以区别，这样的文字并不少见，但什么是小说，小说的完整形态如何表述，当时的理论文章就比较少，且显得简单、空泛。比如，有的说：“小说者，社会之 X 光线也。”^④ 有的说：“小说者，‘今社会’之见本也。”^⑤ 有的说：“所谓小说者，殆

^① 茅盾：《创作的前途》，1921年7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

^{②③}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④ 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1903年《新小说》1卷7号。

^⑤ 侠人：《小说丛话》，《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合理想美学、感情美学而居其最上乘者乎?”^① 有的说：“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② 这些说法各执一端，虽不无可取，但都未道出小说的应有要义。“五四”前后出现的文章，则有明显的进展，一九一八年胡适发表的《论短篇小说》是一篇重要的专论。胡适认为，“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学。”这个定义基本上揭示了短篇小说的特点，同时也接触到文学的典型化问题。胡适还针对当时新、旧小说家不重视结构、布局的缺点，强调指出：“‘短篇小说’是有结构局势的；是用全副气力贯注到一段最精彩的事实在上的。”他在《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中说得更明白：“适以为论文学者固当注重内容，然亦不当忽略其文学的结构。结构不能离内容而存在。然内容得美好的结构乃益可贵。”在这里，他强调了结构对表达内容的重要作用，揭示了结构和内容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稍后，茅盾以更科学、准确的语言，论述了小说的本质特征：“短篇小说的宗旨在截取一段人生来描写，而人生的全体因之以见。叙述一段人事，可以无头无尾；出场一个人物，可以不细叙家世；书中人物可以只有一人；书中情节可以简至仅是一段回忆。”^③ 与小说正名有关联的，“五四”小说理论比之近代小说理论，还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小说概念净化了，以往总是把小说和戏曲等民间形式相混，“五四”时期则明确把小说和戏曲分开，统统归入文学之林；二是小说表现的范围扩展了，梁启超等人强调小

^① 东海觉我：《小说林·缘起》，《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② 黄摩西：《小说林·发刊词》，《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茅盾选集》第5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说描写时事，抒发政治理想，而“五四”时期的小说，则进一步扩展到人生、社会的各个方面。

二是小说从以“教化”为中心思想观念向以真善美为中心审美观念的逐步过渡和转化。如前所述，近代小说理论，偏重于功利这个主要层次上，而“五四”新小说理论则在真、善、美几个层次上都有自己的要求。它十分强调小说和社会人生的密切联系，要求小说为人生，为社会，并改良这人生和社会，要求小说适应时代潮流不断变革和创新，追求真善美的统一。“五四”前后，各种流派的小说作家，不同程度地几乎都触及到这个问题。茅盾在《小说新潮栏宣言》中说：“最新的不就是最美的，最好的……‘美’‘好’是真实。”在《对于系统的经济的介绍西洋文学底意见》中，茅盾就表述得格外清楚：“我以为创作文艺，有三种功夫，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一）是观察，（二）是艺术，（三）是哲理。……三者之中，（二）最难；这是和‘天才’有关的。”周作人在《平民的文学》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只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对真善美关系的认识，茅盾和周作人，从不尽相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语言，得出了相近的看法。傅斯年的《白话与文学心理的改革》，虽是从整个白话文学的改革立论的，但也触及到这个问题。他说：“所谓真白话文学，必须包含三种质素：第一，用白话做材料；第二，有精工的技术；第三，有公正的主义；三者缺一不可。……俄国在近代文学界中放了个大异彩，一半由于他的艺术，一半由于他的主义。……艺术而外无可取，就是我们应当排斥的文学。”傅斯年更加强调了艺术，即美方面的要求。另外，刘半农在《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叶绍钧在《创作的要素》等文中对真、善、美也各有侧重地作了论述。

我们引证了上面好多人的看法，意在说明“五四”小说理论对审美的要求是自觉的，而且不限在一个层次上。同时，也应指出，